

政治动员背景下苏联国内政治中的“敌人形象”*

张建华

[关键词] 政治动员;敌人形象;信息心理战;苏维埃爱国主义;世界主义

[摘要] 冷战时期,苏联共产党和政府运用了“敌人形象”的特殊影响,借以整合和唤起苏联公民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意识,对抗美国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压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苏联国内政治中的“敌人形象”主要是反“世界主义”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运动。

“敌人形象”(образ врага/Enemy image)是苏联政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积极地运用“敌人形象”的特殊影响,借以整合和唤起苏联公民的“苏维埃爱国主义”(совет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意识,以全民和全国政治动员的方式,对抗美国和西方强势的文化和政治压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证明苏联制度的合法性,维护苏联社会的稳定。苏联时期的“敌人形象”基本上可以分为国外“敌人形象”和国内“敌人形象”两部分^①。本文主要论述苏联国内政治中的“敌人形象”,从“敌人形象”的历史文化因素入手,评述战后苏联意识形态整顿运动中“敌人形象”的演变,并对“敌人形象”的功能和效果做出简略评价^②。

一 苏联“敌人形象”的历史文化因素

“敌人形象”在俄国历史是与“反俄罗斯阴谋论”联系相关的,而“反俄罗斯阴谋论”是一种历史现象。当代俄罗斯社会学家古德科夫认为:在俄罗斯“阴谋论既是敌人形象的变体,也是敌人形象的另一种表述”^③。

自10世纪基辅罗斯立国之后,俄罗斯一直处于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的紧张环境之中。俄罗斯的四邻,西部的波兰人、日耳曼,西北部的立陶宛人和瑞典人,南部的土耳其人,东部的蒙古鞑靼人都或长或短地占领或统治过俄罗斯。特别是蒙古鞑靼人的后裔金帐汗国统治俄国2个多世纪。因此,在俄国历史上,异民族、异宗教和异文化祸害俄罗斯是历史事实,更是一个历史神话。因此,在俄国历史上,各种“反俄罗斯阴谋论”极为流行。如沙皇彼得一世在其遗嘱中强调俄国四邻均是敌人,“朕认为,即将来临的北方对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苏联早期的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10YJA770068)。

① 笔者另著有《冷战背景下苏联对外政治中的“敌人形象”》,《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

② 汉语学界关于本专题的讨论尚未见,敬菁华的《当代俄罗斯社会的敌人形象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仅在背景中对苏联时期的“敌人形象”有所提及。苏联和俄罗斯学界研究成果较多,代表著作如莫德尔任斯卡娅的《世界主义——帝国主义奴役其他民族的意识形态》[(Модернская Е. Д.,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порабощения наций),莫斯科1958年版]、莫德尔任斯卡娅与他人合著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Модернская Е. Д. и др., Идеолог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онизм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莫斯科1978年版]、法切耶夫的《苏联宣传中的敌人形象(1945~1954)》[(Фатеев А. 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莫斯科1999年版]、利西奇多等著《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Лисичкин В. А. и др., Третья мирова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莫斯科2000年版。该书中文版由徐昌翰等翻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欧美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仅见芬兰学者索尼卡·文森的《形象研究和和敌人形象:芬兰冬季战争中的苏联(1939年9月30日至1940年4月13日)》[(Sinikka Wunsch, Image Research and the Enemy Image: The Soviet Union in Finnish Newspapers during the Winter War, November 30, 1939~March 13, 1940), <http://herkules.oulu.fi/isbn9514266331/html/t857.html>]。美国学者西蒙科的《形象和军备控制:里根时期的苏联印象》[(Keith L. Shimko, Images and Arms Control: Percep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密执安1991年版]。另外美国外交史名家拉菲博在1980年再版的《美国、苏联和冷战(1945~1980)》[(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80),纽约1980年版]中对此问题有所提及。

③ 古德科夫:《意识形态自觉:作为大众合并症和社会文化综合机制的“敌人”》,载《敌人形象》(Гудков Л., Идеологема врага: Враги как массовый синдром и механизм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 Образ врага.),莫斯科2005年版,第11页。

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入侵是上帝命定和设计的一种周期运动,正如上帝曾以同样方式安排野蛮人的入侵以促使罗马民族获得新生一样。这种由北极向南移民的运动有如尼罗河水的回流,它定期用自己的泥土使埃及西部的土地变得肥沃”,因此要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做出努力。挑选最有利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和日益繁荣”^①。

俄国历史上的“反俄罗斯阴谋论”主要有以下两个来源:

其一是“共济会阴谋论”。共济会(Freemasonry/масонство)起源于英国,最初是石匠秘密的同业行会,后传播到欧洲各国。自18世纪初传入俄国以后,直至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社会中,尤其是社会上层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数众多的俄国贵族、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包括沙皇家族成员加入俄国共济会。俄国共济会与近现代俄国政治、宫廷政变、社会革命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对俄国近现代政治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构成了俄国近代以来一种新的非官方政治因素及政治变迁的驱动力。共济会还是“俄罗斯第一个自由的自我组织的社会团体,只有它不是政权从上面硬塞给人民的”^②。

俄国共济会作为秘密组织,它有着特殊的入会仪式、等级差别以及联系方式。“世界主义”(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是俄国共济会认同的原则,“宇宙就是自由石匠们的祖国”^③,共济会员称自己为“胸襟坦荡的世界主义者或世界公民”^④。俄国共济会追求人类生活及形式方面的统一,不分民族,没有国家,没有阶层的划分,只有一个政府。另外,俄国共济会持自然神论,在他们看来,神是所有生命的唯一来源,无论这个神来自哪种宗教,无论人类的心灵通过哪种宗教仪式与其交流;各种宗教的信奉者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宗教都应统一于一种宗教之下。在这种世界主义哲学观和宗教观的影响下,俄国共济会与其它国家的共济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无论是在18、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都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

正是因为俄国共济会秉承“世界主义”、“自然神论”和“天下一家”的宗旨并且以秘密方式积极涉入俄国上层社会,干预俄国政治,因此它被看成是俄国社会和文化的异己力量,是败坏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威胁俄罗斯国家的破坏力量。沙

皇政府时常对共济会采取禁毁态度,俄国社会也对其持否定态度。如当代俄罗斯学者索罗金评价:“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俄国期间对共济会员的镇压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共济会的各种活动也被视作某种邪恶……”^⑤

其二是“犹太人阴谋论”。有关“犹太人阴谋论”的说法早在12世纪就出现了,它伴随耶路撒冷的圣殿骑士的秘密组织而产生。早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分歧,基督教教徒视犹太人为魔鬼,是阴谋颠覆基督教的敌基督。“犹太人阴谋论”是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各国政府迫害犹太人的一个主要的理由。

犹太民族群体在公元14世纪初出现俄国境内。到20世纪初,世界上的犹太人大约半数居住在俄罗斯帝国境内,1897年的俄国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俄国境内的犹太居民人数为522万人^⑥。历代沙皇政府以及各级统治者对等犹太人始终是采取限制、压制和迫害的政策。

1903年,由民族主义者克鲁舍万主编的杂志《旗帜》(Знамя)(8月28日至9月7日)发表了《犹太智者议定书》(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的全文文本。1905年12月9日,《犹太智者议定书》单行本在彼得堡出版。反犹太主义者尼鲁思于1905年12月出版《小中之大和作为近期政治可能性的敌基督》(Великое в малом и антихрист как близ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也将该文本收入书中。《犹太智者议定书》整个文本围绕一个主题:犹太人如何控

① 关于“彼得一世遗嘱”的真伪,刘祖熙和刘存宽两位先生已有论述。详见刘祖熙:《……文章标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4期;刘存宽:《……文章标题》,《百科知识》1980年第4期。遗嘱译文见《……文章标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② 别尔嘉耶夫著,雷永生等译:《俄罗斯思想》,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7页。

③ 索卡洛夫斯卡娅:《俄国共济会和它在社会运动史中的意义(18世纪和19世纪头25年)》[Соколовская Т. О., 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XVIII и первая четверть XIX столетия)],莫斯科1999年版,第26页。

④ 索卡洛夫斯卡娅:《俄国共济会和它在社会运动史中的意义(18世纪和19世纪头25年)》,第26页。

⑤ 索罗金:《保罗一世和自由石匠》(Сорокин Ю. А., “Павел I и «Вольные каменщики»»),《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5年第11期。

⑥ 泽夫·卡茨等著,费孝通等译:《苏联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3页。

制非犹太民族,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如何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宗教领域制造混乱、蛊惑百姓、扰乱经济、发动战争,不择手段实现建立全球性的“犹太王国”的目的。

《犹太智者议定书》发表于1905年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刻,配合了沙皇政府和黑色百人团的将俄国政治动乱的原因嫁祸于犹太革命家而镇压革命的行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反犹分子加大对《犹太智者议定书》的宣传,把犹太智者的阴谋计划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相提并论。

《犹太智者议定书》已被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米留科夫、捷列夫斯基、斯瓦季科夫证明纯属伪造。文本是19世纪90年代由沙皇政府警察局国外分部总监拉奇科夫斯基指派人员伪造的,目的在于把俄国动乱和革命的起因归结于犹太人、共济会的阴谋。尽管如此,仍然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东正教极端保守派和黑色百人团分子利用,成为俄罗斯20世纪初反犹运动乃至全世界有影响的犹太人阴谋论的理论基础,并且流毒甚广。

二 苏联国内“敌人形象”的塑造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就处于内忧外患的险恶环境之中,“敌人”和“敌人形象”就现实地存在于苏联社会和政治之中。

早期的国内“敌人形象”具有可见性和暂时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敌人形象”一般都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的“敌人”密切相关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较频繁更替。

在国内战争时期,以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尤登尼奇、克拉斯诺夫等旧俄将军为代表的白卫军和白卫分子,以马赫诺、彼得留拉为代表的乌克兰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国内敌人,因此俄共(共)中央于1919年7月9日发布了列宁起草的公开信《大家都去与邓尼金作斗争!》。

在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20年代,随着上述军事领域的“敌人”被消灭,“敌人形象”也随之转换。这一时期的“敌人”大多是暗藏的但仍然是现实存在的敌人,他们是新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耐普曼”(НЭПМАН)和富农,是被列宁斥为“‘有教养’的农奴主”并强调“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①的反苏知识分子,以及

社会革命党反对派。在“为高等学校无产阶级化而斗争”的口号之下,高等学校展开对大学生的政治清理运动。1928年列宁格勒大学开除学生712人,其中有75人是因为自己的出身^②。

在192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苏联国内的“敌人形象”开始了外延化和虚拟化的过程。联共(布)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即是“敌人形象”的预备者。

1928年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在顿涅茨矿区的煤矿破获了一起反革命案件,被称为沙赫特案件^③。老布尔什维克、《红星报》副主编柳亭于1932年3月秘密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起草《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和《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向全党呼吁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恢复列宁的准则的原则,主张停止强制集体化。呼吁书直称斯大林是“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和“俄国革命的掘墓人”。斯大林要求苏联法制机关立即判决柳亭等人死刑,这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第一次直接下令判决普通党员死刑的先例。1937年1月20日,苏联最高法院以“从事针对国家领袖的恐怖主义分子”罪责判处柳亭极刑,当天立即执行枪决。

上述两大案件使斯大林得出结论,即:“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④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655页。

② 希卡鲁科:《俄罗斯居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形势反映》(Шикарук С. А., “Отра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载《1921~1941年俄国日常生活:新观点》(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1921~1941 гг.,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圣彼得堡1995年版,第33页。

③ 沙赫特是俄文“矿井”(Шахт)的音译,据称从1922~1923年起,顿涅茨矿区的俄国和外国企业主和一些反动资产阶级专家就与白俄“巴黎中心”组织联系,接受其指示和经费。他们窃取当地的领导权,唆使工人反对党的领导。1928年5月18日至7月6日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在53名被告(沙赫特分子)中除4人被宣判无罪外,有11人被处决,其他的人被判处1~10年徒刑。

④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页。

委书记基洛夫惨遭暗杀是大清洗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当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未经政治局讨论,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定,宣布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做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托洛茨基等人便上升为苏维埃“敌人形象”的代言人,“叛徒”“间谍”“人民的敌人”“人民敌人的妻子”“人民敌人的儿子或女儿”都成为接受刑罚的罪名和“敌人”的代名词。

在卫国战争的特殊年代,“敌人”和“敌人形象”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国外的“敌人形象”——德国法西斯及其盟友成为真实可见的苏联主要的“敌人形象”。以叛降德国的苏军将领弗拉索夫为代表的“俄罗斯解放军”以及国内暗藏的“弗拉索夫分子”是国内“敌人形象”的主要代表者。在此期间,苏联政府还以“与敌合作”为名,将日耳曼、鞑靼、印古什、车臣、朝鲜、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等12个民族统统视为“敌人”或“潜在的与敌合作者”,将整个民族强制迁移到中亚或远东,以示惩罚。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国内的“敌人形象”因国外“敌人形象”的转换而转变。在苏美关系由友谊到齟齬,最终走上冷战之路的过程中,苏联国内“敌人形象”逐渐完成其虚拟化和形象化的塑造过程。

卫国战争期间,为反法西斯战争和前线的需要,苏联政府一度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借以鼓励作家、艺术家们以自己的创作服务于全民战争。著名作家和出版家维尔塔、波列伏依、斯米尔诺夫、吉洪诺夫、托尔斯泰、法捷耶夫、费定、列昂诺夫、肖洛霍夫、爱伦堡等人积极参加了苏联情报局文学小组的工作。通晓欧洲多种语言的爱伦堡、列昂诺夫、斯米尔诺夫、费定等作家的作品和文章在国外很有影响,美联社转交给爱伦堡报纸,内称上千万美国听众借助书信认识了“不知名的美国朋友”。作家维什涅夫斯基强调:“所有的文学是国防的。”^①苏联情报局对作家们提出了要求:“个别的事实和概括应该反映我国军队的军事特点,反映前线和后方团结一致……尽管有着巨大的困难、巨大的牺牲、我们在不可动摇的道德的统一的的前提下勇往直前。这意味着真实地反映,苏联就在于苏联的力量。”^②爱伦堡认为战争时期爱国作家的使命就

是:“应该注视摆在自己面前的希特勒分子的面貌:这是应该准确无误射击的靶子,这是我们厌恶的化身。我们的责任就是燃起对于恶的憎恨和巩固我们美好的、善良的和正义的东西。”^③

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在十月革命后一直被视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自1930年代后,几乎从未公开发表诗作。阿赫玛托娃在卫国战争期间也参加了“苏维埃爱国主义”宣传活动,创作诗篇《起誓》(Клятва, 1941)、《勇敢》(Мужество, 1942)和《胜利》(Победа, 1942~1945)。阿赫玛托娃在自传中谈到这个特殊时期她的感受:“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阴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④

卫国战争结束,阿赫玛托娃继续她的创作并延续时战争期间的社会反响。1946年在莫斯科举办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朗诵晚会,这次晚会的参加者、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说法,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威性的辉煌胜利”^⑤。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在1946年发表了《猴子奇遇记》(Приключения обезьяны),他成了最受欢迎的作家。报章杂志争先恐后刊载他的作品,广播和舞台上纷纷演出他的节目,剧院抢着上演他的剧本。

然而,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和主管联共(布)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日丹诺夫对思想文化界的自由主义倾向表示极度担忧。斯大林亲自主持的对《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批判

① 克拉西拉什科等编辑:《来自苏联情报局:1941~1945年战争年代的政论著和特写》(Красильщик С. и др.,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请补充完整 1941~1945.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第2卷,莫斯科1984年版,第460页。

② 克拉西拉什科等编辑:《来自苏联情报局:1941~1945年战争年代的政论著和特写》第2卷,第470页。

③ 爱伦堡:《艺术的职责》,载《文学和艺术》(Эренбург И., Долг искусства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1943年7月3日。

④ 阿赫玛托娃:《文集》(Ахматова 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第3卷,莫斯科1998年版,第26页。

⑤ 《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1988年5月20日。

拉开了战后意识形态批判的序幕,这场意识形态围剿的对象是“全面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和寻找文化艺术界的“敌人形象”。

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星》(Звезда)和《列宁格勒》(Ленинград)两杂志问题的讲话,激烈批评了这两份杂志以及上面发表的具有“资产阶级”和“反苏维埃”性质的文章。8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联共(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谴责在《星》上登载的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的作品和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发表的作品,认为它们是毫无思想内容的、意识形态上有害的作品^①。在决议中明确宣布:“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左琴科一直专门写那些空洞无物、庸俗无聊的东西,鼓吹腐朽的、无思想内容的、低级趣味的、不问政治的东西,妄图使我们的青年迷失方向,毒害他们的思想。在琴科最近出版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方式及苏联公众的下流诽谤。左琴科丑化苏联制度和苏联人,把苏联人说成是野蛮落后、文化低下和愚蠢之极的人。”^②

8月15日,即在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决定后之次日,专程到列宁格勒作说明的主管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日丹诺夫,在该市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报告说:“这个问题经斯大林同志倡议已在中央委员会做过讨论:他亲自过问了这两个杂志的工作……并建议讨论这两个杂志领导上的缺点,而且他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作过指示;这些指示成为这个决定的基础”。^③他批评左琴科:“惯于嘲弄苏联生活、苏维埃制度、苏联人,用空洞娱乐和无聊幽默的假面具掩盖这种嘲弄”“左琴科这个市侩和下流家伙给自己所选择的经常主题,便是发掘生活最卑劣的、琐碎的各方面……这是一切下流市侩作家——左琴科也在内——所特有的东西”。^④日丹诺夫以极其苛刻但不文明的语言称有“俄罗斯诗歌月亮”之称的女诗人是“不知是修女还是荡

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Не то монахиня, не то блудница, а вернее блудница и монахиня, у которой блуд смешан с молитвой)^⑤,于是苏联爱国女诗人立即变成了“敌人”——“资产阶级”“贵族”“荡妇兼修女”。中央宣传鼓动部为首的宣传机关立即开足马力,动用一切工具和手段来批判二人。阿赫玛托娜与作家左琴科立即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

1946年10月1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报告中称:中学十年级的教材《现代文学》(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其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称之为“现代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随后删去了关于二人的描述^⑥。实际上,从开始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到二人最终消失在文字记载与公众视野下,联共(布)中央和宣传鼓动机关都有一套模式化的操作程序与方法,以求最大限度抵消被批判者造成的所谓“恶劣影响”。在这种凡事都必须与政治挂钩的文化体制下,宣传鼓动局机关不是去创作促进文化真正繁荣的制度性环境,而是拿着放大镜在知识分子的创作中寻找“反党反社会”的只言片语,并将其演化成政治上的种种不纯洁与

- ① 《联共(布)中央组织局 1946 年 8 月 14 日关于斯大林提议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草案》[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 с правкой И. В. Сталина, 14. 08. 1946],《斯大林和世界主义》档案第 19 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 19)。
- ② 雅科夫列娃:《俄共(布)中央—联共(布)中央,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部关于文化政策的档案(1917~1953)》(Яковлева А. Н.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 ВКП(б), ВЧК — ОГПУ —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莫斯科 1999 年版,第 589 页。
- ③ 《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1988 年 5 月 20 日。
- ④ 曹靖华等译:《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40 页。
- ⑤ 基明齐科编辑:《安魂曲》(Тименчик Р. Д. Реквием),莫斯科 1989 年版,第 236~238 页。
- ⑥ 《中央宣传鼓动部 1946 年 10 月 1 日关于教科书(现代文学)中“真正的政治错误”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帕多里切夫的报告》[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секретарю ЦК ВКП(б) Н. С. Патоличеву о “серьез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шибках” в учебн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01. 10. 1946],《斯大林和世界主义档案》第 27 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 27)。

背叛之处。

1948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判穆拉杰里创作的歌剧《伟大的友谊》(Великая дружба)理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错误的,歌剧苍白没有表现力。3月12日新上任的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列别杰夫(П. Лебедев)便迫不及待地向日丹诺夫提议设立荣誉法庭来审判一些被揪出各式错误的形式主义音乐家,实际上设立荣誉法庭的联共(布)中央决议于18日才出台。^①在卫国战争艰难岁月中创作出振奋人心的《列宁格勒交响曲》的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也因歌剧《伟大的友谊》受到批判与牵连。

三 虚与实:反“世界主义”与反犹太主义

尽管在早期苏维埃政权中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莫洛托夫的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等高级领导人都是犹太民族属性,并且斯大林在1931年1月12日给犹太通讯社写的题为《反犹太主义:答美国犹太通讯社记者问》信中强调了苏联政府反对反犹太主义的立场,即“在苏联,反犹太主义作为和苏维埃制度为敌的现象,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按照苏联法律规范,反犹太主义者应被判处死刑”^②,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反犹太主义几乎贯穿整个苏联时代,并且在苏共党内、党内高层和苏联社会里都极有市场。

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苏联国内政治气氛日渐紧张,犹太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反犹太主义成立斯大林手中的武器。1930年,俄共(布)中央的犹太部被撤销,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运动中,一大批的犹太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其罪名是里通外国的“犹太世界主义者”。

“世界主义”是在整个苏联时期经常被苏联政府提及的政治关键词,而在知识分子之中即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灾难之词。在由苏联权威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世界主义”条目的解释是:“一种宣传漠视自己祖国利益、漠视民族传统、漠视民族文化、放弃民族主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种宣传是在承认整个世界是每一个人的祖国的幌子下进行的。……帝国主义者力图用关于世界主义、‘世界政府’等思想宣传来麻痹人民的警惕性,在他们中间培植背叛祖国和出卖民族局外的

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世界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是不能相容的。”^③

苏联政府在1942年2月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担任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的是苏联莫斯科犹太国立剧院演员兼导演所罗门·米霍埃尔斯。委员会的任务是与美国等国的犹太人富商联系,以获得对方的资助。“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时的所作所为为苏联扭转战局、击败纳粹起了重要作用。

1947~1948年,苏联在国内掀起一场反对“世界主义”运动,“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④,在苏联民众当中“灌输对西方的反感和敌意”,当预期的冲突发生时培养起一种好战的精神。苏联犹太人因为和西方联系最广、受西方影响最大,因而沦为打击的重点对象。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事件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政府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发生巨变,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前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⑤,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М. Д. Рюмин)指控犹太民族“是一

①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7年3月28日关于“荣誉法庭”的决议》(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удов чести”, 28. 03. 1947),《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37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37)。中国学者闻一认为荣誉法庭的产生与战后苏联国内贪污腐化和羡慕西方物质文明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但是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知识分子。参见闻一:《“荣誉法庭”——“为布尔什维克荣誉而战”》,见<http://www.studytimes.com.cn/WebPage/xxsb/html/3652.html>和<http://www.studytimes.com.cn/WebPage/xxsb/html/3558.html>。

② 《斯大林文集》第13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30页。

③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中央编译局译:《简明哲学辞典》,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1页。

④ 苏多普拉托夫著,魏小明等译:《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65页。

⑤ 姆列钦著,李惠生等译:《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个间谍民族”^①。“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犹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大量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不仅把苏联犹太人看成是一个民族群体，而且把犹委会看成是他们的代表，无论苏联犹太人还是犹委会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②。

1948年3月26日，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人递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文件——《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委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报告：“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新采取的契卡工作手段查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他直接指控犹委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战前好久就是一个著名的民族主义积极分子，曾经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犹太人的一面旗帜”^③。

阿巴库莫夫在斯大林去世后供认：“1948年苏联政府领导人约·维·斯大林给了我一项紧急任务——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干掉米霍埃尔斯，此事可委派专门人员执行。”^④1948年1月12日晚6点，国家安全保卫部的汽车绑架了米霍埃尔斯等人，大约在晚上10点钟，“他们立即被从车上拖下，并用货运汽车轧死了他们。夜里12点左右，当明斯克市内开始无人走动时，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走，并抛在市内一条偏僻的大街上”^⑤。1月15日，《真理报》刊发了米霍埃尔斯的死讯^⑥，苏联国内外为之震惊。《真理报》称赞米霍埃尔斯是“一位杰出的演员，艺术家，导演和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高度评价了他在戏剧创作和表演方面的伟大成就与突出贡献，但是对其死因却只字未提。有一个地方提到他是苏联犹委会主席，但是却没有任何相关报道。1月16日，苏联官方为米霍埃尔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盛大的葬礼。《真理报》报道说，有数万莫斯科人参加了追悼会。而著名作家、犹太人爱伦堡当进就断定“米霍埃尔斯被杀害了”^⑦。

1948年12月8日，《消息报》工作人员别吉切娃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世界主义者——敌人占据艺术领域”的信。作者在这封信开门见山地写道：“敌人正在艺术领域中活动，我用生命为这些话担保”，在信中指出在戏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和

戏剧活动家中间存在着大批世界主义者，并列出了诸多世界主义者“反对党的戏剧”和“向人民艺术进攻”的言论^⑧。这封信即是战后规模最大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开端的预兆。

1949年1月23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联共（布）中央秘书处提交了名为“在戏剧评论中与世界主义作斗争的”决议草案^⑨。该决议草案指出，在戏剧评论界中汇聚了一个反党的、资产阶级审美立场的世界主义者派别，该派别垄断了戏剧评论界，它的活动给苏联戏剧艺术的健

① 乔纳森·布伦特和弗拉基米尔·P. 纳莫夫：《斯大林最后的罪行：医生谋杀案》（Jonathan Brent and Vladimir P. Naumov. *Stalin's Last Crime: The Doctor's Plot*），伦敦2003年版，第184页。

② 西蒙·雷迪奇：《战争、浩劫和斯大林主义：一项关于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档案研究》（Shimon Redlich, *War, Holocaust and Stalinism: 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伦敦1995年版，第162页。

③ 西蒙·雷迪奇：《战争、浩劫和斯大林主义：一项关于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档案研究》，第133页。

④ 科斯特琴科：《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1～1948年）：档案史》（Костыренко Г. 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莫斯科1996年版，第358页。

⑤ 科斯特琴科：《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1～1948年）：档案史》，第358～359页。

⑥ 苏联政府对米霍埃尔斯的死因进行了“调查”。1948年2月11日，莫斯科警察总局给苏联内务部副部长谢罗夫呈交了一份经过精心编造的事发现场调查和尸检报告，宣称“没有证据表明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一波塔波夫死于其它原因。只是死于意外车祸。”见：科斯特琴科：《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1941～1948年）：档案史》，第354～356页。

⑦ 爱伦堡著，冯南江等译：《人·岁月·生活》下卷，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第467页。

⑧ 《〈消息报〉工作者别吉切娃1948年12月8日关于“世界主义者——敌人占据艺术领域”给斯大林的信》（Письмо работника газеты “Известия” А. Бегичевой И. В. Сталину о засилье “врагов-космополитов” в искусстве, 08. 12. 1948），《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85号（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умент №85）。

⑨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1949年1月23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提交关于与戏剧评论界的世界主义斗争的决议草案》，《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67号（Агитпроп ЦК ВКП(б) - в секретариат ЦК ВКП(б) с проекто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 борьбе с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ом в театральной критике, 23. 01. 19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умент №67）。

康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1月28日,反世界主义运动开启了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真理报》刊发了《一个反党的戏剧评论家派别》的编辑部文章,指出在戏剧评论界中存在着一个反党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者派别。次日,《文学报》刊发社论《彻底揭发反党的戏剧评论家派别》,剑指“奴颜婢膝地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世界主义”^①。1月30日,《文化与生活》(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报亦刊发社论《反党戏剧评论家派别的阴谋诡计》,再次挾伐了“世界主义”与“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最后倡议“为了扫除这些巨大的障碍和保障苏联戏剧艺术的继续繁荣,必须彻底消灭不爱国的、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的戏剧评论”^②。

1949年2月10日,苏联艺术学院院长格拉西莫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为了艺术界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指出“苏联的造型艺术在与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斗争中达到了创作上的胜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彻底揭露形式主义者 and 世界主义,彻底揭露他们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艺术的畸形现象带到我们现实中去的女才式附和行”^③。2月16日,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格里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反对诗歌中的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再次用大量的篇幅极其严厉地批判了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指责他们“阻碍了我们文学的发展”。^④4月6日,苏联外交部出版局局长弗兰采夫在《真理报》发表了《世界主义——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武器》的长文,指出“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战略武器库中,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在世界主义的幌子下美帝国主义极力试图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⑤。

随后,在反对“世界主义者”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大批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被捕。从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诺夫策,一直到遥远的比罗比詹,从文艺界到医疗卫生界,从政界到宗教界,仅仅两个月就有数百名犹太人政治和文化精英被捕。1948年11月被苏联当局以进行反苏宣传、向国外情报机构提供反苏情报的罪名勒令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久,其领导人相继被捕入狱,在受尽摧残和折磨之后,于1952年8月被处以极刑,从而酿成了苏联历史上的一大悲剧。1949年2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

解散犹太人作家协会的决议。1949年3月,关闭犹太国家剧院的报告。不久,国内所有的犹太国家剧院全部关闭,唯一的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也被查封。

1949年7月19日,中央宣传鼓动部上呈报告,指出刚出版的单卷本《俄语词典》除了收录了一些必要的外国科技词汇外,还含有一些在俄语中根本用不上的词汇,如“老爷”(Денди/ Dandy)这样反映剥削生活的外来词汇,并建议将其从词典中清除出去。7月26日,中央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报告,支持禁止发行已经印刷完毕的《卫国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丛书,认为该丛书“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千方百计地为英国和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各种政策辩护,没有揭露英美帝国主义掠夺性的本质……刻意掩饰英美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现实原因,夸大了英美在反法

① 《文学报》1949年1月29日社论《彻底揭发反党的戏剧评论家派别》(“До конца разоблачить антипатриотическую группу театральных критиков”.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стать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азеты”, 29. 01. 1949),《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1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01)。

② 《文化与生活报》1949年1月30日社论《反党戏剧评论家派别的阴谋诡计》(“Ну чуждых позиций. О происках анти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ы театральных критиков”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статья газеты “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 30. 01. 1949),《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102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02.);

③ 《苏联艺术学院院长格拉西莫夫1949年2月10日发表在《真理报》的文章《为了艺术界的苏维埃爱国主义》》(“З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 в искусстве”. Статья в “Правд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кадемии художеств СССР А. М. Герасимова, 10. 02. 1949),《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109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09.)

④ 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格里巴乔夫1949年2月16日在《真理报》上文章《反对诗歌中的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Против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 и формализма в поэзии”. Статья в “Правде” секретаря партбюро ССП СССР Н. М. Грибачева, 16. 02. 1949),《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113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13.)

⑤ 苏联外交部出版局局长弗兰采夫1949年4月6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世界主义——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武器》(“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руж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реакции”. Статья в “Правде” заведующего отделом печати МИД СССР Г. П. Францева, 06. 04. 1949),《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145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45)。

西斯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了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历史作用”^①。

就连在卫国战争期间极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重视和重用的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战后几乎立即被看成是与美国等西方情报机关联系的“世界主义者”,而被禁止发表著作和公开言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犹太人身份。爱伦堡在回忆录写道:“对‘世界主义者’的迫害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逮捕了大批的人,其中有的是曾被法西斯俘虏(这当然不是他们一人之过)的,有的是没有来得及撤退的,有的是自愿从侨居国回来的,有的是在30年代受过惩罚的,有的是在国外有亲属的。”^②爱伦堡本人每夜都在等候着电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那意味他也被捕了。报刊上停止发表他的文章,亲朋好友也不敢登门,只能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打来电话,当听到爱伦堡回答“是我”,对方就放心地放下电话。在另一个场合,一位大人物已经公开宣布:“头号世界主义者、人民公敌伊利亚·爱伦堡被揭发和逮捕了。”^③爱伦堡在回忆录将其看成是“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1942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被强制合并苏联后,当地反对加入苏联的犹太人大量地被驱赶出苏联国境或者被大量地关进各地的集中营。美国学者泽夫·卡茨估计有20万人之多^④。1940年代中期后,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大俄罗斯主义急剧膨胀,反犹太主义盛行全国全党。1953年1月,在斯大林去世前2个月,因克里姆林宫医院女医生季玛舒克(Лидия Тимашук)的告密,内务部长贝利亚制造一起莫须有的“医生谋杀案”,即所谓的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医生与国际犹太人恐怖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以“有害的治疗方法业缩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命”,在被捕的9名著名医生中有7名是犹太人。随后,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及高等院校中被赶走。到斯大林去世时,“甚至在党的区委书记中,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犹太人”。^⑤而季玛舒克本人却因“协助揭发医生杀人犯”而荣获列宁勋章。

1956年4月,华沙的意第绪语报纸《Folkshimme》(……中文译名)公布了一份纳粹大屠杀前后非正常死亡的苏联犹太人名单。世界舆论要求苏联领导人对此做出解释,并开始打听关于目前犹太教育体制和犹太文化的情况。这份

名单同样促使一群犹太世界的知名人士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澄清事实。

在整个苏联时期,在苏联社会和民间组织中也时隐时现反犹太主义情绪和活动。1956~1958年苏联出现了宣扬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人民民主党、俄罗斯民族党、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党。在这些组织的秘密集会上传播《犹太智者议定书》,重建“犹太人阴谋论”。活跃在莫斯科的“祖国”(Родина)和列宁格勒的“俄罗斯”(Россия)俱乐部借宣传俄罗斯文化传统,推荐阅读19世纪俄国反犹太主义者罗赞诺夫、列昂季耶夫、克朗施塔得斯基的作品。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还以《犹太智者议定书》为蓝本,编写《苏联犹太人教义问答》(Катехизис советских евреев),在地下出版社印刷并在全国传播。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强调犹太人控制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迫害俄罗斯民族,目的在于毁灭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口号的政治改革深入,以及苏联政府放松书报检查制度和社团制度,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明斯克、基辅等的民族主义团体“纪念”(Память)“祖国”(Родина)开始重新解读《犹太智者议定书》,对其内容做注解,把苏联社会混乱、经济严重下滑的原因归结为“犹太人阴谋论”。民间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反犹太主义活动在客观上符合或迎合了苏联政府的政治动员。

1950~1960年代,随着苏联政治环境的“解冻”以及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有大批的苏联犹太人申请移居以色列或赴以色列旅游。苏联政府对此加以严格的限制。1970年代初至1980年

① 《中央宣传鼓动部1949年7月26日呈苏斯洛夫的关于支持禁发《卫国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丛书的建议》(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 А. Сулову в поддержку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б изъятии из библиотек книг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26. 07. 1949),《斯大林与世界主义》档案第187号(Архивы: 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Документ №187)。

②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第472页。

③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第472页。

④ 泽夫·卡茨等著:《苏联民族手册》,第506页。

⑤ 欧文·豪著,王海良、赵立行译:《父辈的世界东欧犹太人移居美国以及他们发现与创造生活的历程》,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750页。

代末,由于苏联政府放松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控制,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浪潮,到1982年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25万人之多^①。这些犹太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近七十年代,他们同苏联其他民族一起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毫无疑问,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一制度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苏联,移居他国呢?恐怕无法排除苏联反犹太主义的负面影响和压力。

四 苏联政治文化 和政治动员视野下的“敌人形象”

政治动员(Political mobilization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是指以一定的政治主体为凝聚力量,为实现某一政治目标,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鼓动,它一般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一般是国家或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之举动。苏联作为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国家,其政治动员不仅在非常时期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也是苏联国内政治和对外政治中的行之有效的一种常态行为,对苏联政治体制的运作和维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苏联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敌人形象”是社会对抗的意识形态反映、敌对国家和公民力量的鲜活象征、社会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从长时段来看,它存在于俄国历史之中,但从20世纪的苏联时期政权方开始有计划 and 系统地在大众意识中宣传“敌人形象”。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冲突是苏联式的“敌人形象”的主要来源。当代俄罗斯学者法切耶夫认为:“敌人形象是‘心理战’的重要手段,是政治敌人们有目的倾向和计划的利用宣传,其中包括以简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敌人、朋友或自己的居民的看法、感受和行为,目的在于适合政府倾向。‘政治宣传’或者简单‘宣传’是指借助大众媒体和象征方式系统作用于大众意识,以达到预想的政治目的。然而,为了有效的作用于大众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容就应该充满‘信息真实性’的所有要素——思想和象征的组合、理解和平的方式,这些都是通过信息的来源完成,宣布内容决定了大众和个人的意识开行为。”^②

苏联国家是典型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为导引的国家,苏维埃文化是典型的政治文化,是

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自上而下的制度层面和管理层面的意识形态安排,是苏联社会角色自下而上对苏联政治系统的认识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的总和。政治动员与敌人形象的结合,即构成了苏联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的本质特性,苏维埃文化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型文化,苏维埃文化是自下而上响应的大众型文化。苏联政治动员中的“敌人形象”的重要职能则是广泛调动和整合苏联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确保针对苏共领导的行动上和意识上的双重一致性,保障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稳定。

苏联的“敌人形象”经历了从实际存在到虚实结合再到虚拟扩大的发展过程,在1947年开始的苏美冷战背景下,在1948~1949年的意识形态大批判和反世界主义运动中最终形成了它的具体模式。

苏联的国外“敌人形象”主要是指人格化了的美国帝国主义,1949年4月苏联政府制定的《近期反美宣传强化措施计划》(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指示宣传者把注意用在损害美国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威信之上。具体包括:叙述美国经济大危机的各种征兆,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在美国扶植法西斯主义、美国文化和道德的堕落与腐朽,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将科学用于军国主义备战,新闻出版的厚颜无耻,社会犯罪率急速上升,美国政府中存在着危险的反苏阴谋者,美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并为达到这一目的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作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思想进攻武器的“世界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将导致西方阵营瓦解,等等。

国外“敌人形象”的确立,首先是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形象,被苏联宣传机构利用,目的在于维护自己在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它正处在所谓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之下。美国敌人形象系统被运用于在意大利、联邦德

^① 阿尔蒙德等著,朱曾汶、林铮译:《当代比较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77页。

^② 法切耶夫:《苏联宣传中的敌人形象(1945~1954)》(Фатеев А. 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1945~1954 гг.),莫斯科1999年版,第7页。

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心理战之中,目的在于瓦解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苏联的国内“敌人形象”即是“世界主义者”和代表这一危险思潮和政治运动的犹太人。联共(布)中央宣传运动部副部长舍皮洛夫、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文学报》总编叶米洛夫负责完成联共(布)最高领袖斯大林、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的政治任务。在1949年反世界主义运动过后,世界主义被划分为不同时代的特征:犹太复国主义、泛美主义、泛伊朗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艺术上表现为:颓废主义、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在生物学方面表现为: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流氓式青年前卫行为。于是,“世界主义”成了苏联政府在不同时期所利用的制造“敌人形象”的主要借口,它是作为美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第五纵队”。

在苏联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之中,国内“敌人形象”主要是指各个时期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人员,而犹太人形象则是虚拟化的苏联“敌人形象”之一,它是和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和现实中的大俄罗斯主义相关联的。著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指出:“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反犹性质。在当时的日常政治用语中,‘世界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人’几乎就是同义词。”^①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卫国战争期间以自己的文笔、创作、表演等方式积极参与“苏维埃爱国主义”政治宣传,参与反法西斯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造苏联外部的“敌人形象”的部分作家、诗人、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们在战后的政治运动中本人变成了可疑的“敌人”,昔日“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形象”变成了“敌人形象”。

苏联的国外敌人形象与国内敌人形象不仅构成了苏联敌人形象的全部面貌,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苏联政府所用。国内敌人形象可以使掌权者对苏联公民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国外敌人形象即可以增加苏联公民的团结性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两者结合,可以培养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并将这两种意识上升到“苏维埃爱国主义”的高度。

收稿日期 2010—11—17

作者张建华,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 池 豫】

^①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何宏江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966页。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也承认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具有公然反犹太主义性质。”见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刘白岚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印1980年版,第140页。